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从刊

张謇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

虞和平 主编

K825.38=6

1821

虞和平 主编

张謇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虞和平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12

ISBN 7-80702-140-3

I . 张... II . 虞... III . 张謇(1853~1926)—人物研究 IV .
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5881号

Zhangjian Zhongguo Zaoqi Xiandaihua de Qianqu

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
虞和平 主编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责任编辑 林革华
责任校对 李洁华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封面制作 韩 璐
经 销 吉林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吉林文史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7.875
字 数 500千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 200册
书 号 ISBN 7-80702-140-3/K·5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李文海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译著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

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的不如人意，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这正是历史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在修纂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扩展新的视野，作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研究丛刊》的出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和推动作用。另外，有些难以被新编的清史包涵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总之，我们希望《研究丛刊》成为清史编纂工程同史学界、扩大一点说同学术界、同社会联通和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一个学术平台。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我们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制订明确的工作规程。除此之外，我们仍然想强调几点，作为编委会和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来说，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陈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

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即使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也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学术工作。

当然，创新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历史学的创新，当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实际；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政治前提外，惟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份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人情往来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我们深知，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使已经受到某些污染的学术净土尽量保持自己的纯洁。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点不错的。就学术来说，没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争辩，学术就不能进步，更谈不上学术的繁荣。梁启超就曾说过：“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

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清代学术概论》）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讲到了“学问不厌辩难”的道理，而且还讲了学术论辩应抱的态度。确实，在学术界，恐怕还不能说“双百”方针已经贯彻得很好了。过去，有政治上“左”的影响和干扰，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不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大环境。

因此，有一个正确态度去对待学术争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能够怀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目的，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采用平心静气、充分说理的方法，具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那么，学术争论愈充分，学术气氛就愈活跃，学术研究就愈深入，学术队伍也就愈加团结。我们愿意为形成这样一种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丛刊》的成败，说到底，在于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一点，并且将用我们的工作来努力争取这一点。

2003年8月8日

序

张謇作为中国近代的一个非凡人物，历来颇受各方关注，也曾有过各种各样褒贬不一的评论。

早在张謇事业初成的1910年，就有附设于上海商务总会内的“华商联合报办事处”在其主办的《华商联合会报》^①上刊登张謇的照片，名之曰：“中国大实业家通州张殿撰謇”，并加评语说：“殿撰通籍后，即无意华眩，专一振兴工商农渔诸业，手创公司甚多，均有成效，若江浙渔业、通崇垦务、大达步轮、大生纱厂其尤著者，一时推为中国实业家。陈伯严吏部赠诗云：‘避世甘居廉贾下，忧时槁立野人前。’可以见殿撰之为人矣。”

该报记者雪腾接着评论道：“自托辣斯风潮起，战人国者，不

^① 1907年冬，上海商务总会、商学公会和预备立宪公会召集全国各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商法讨论会，会上提出设立全国商会的联合组织——华商联合会，委托上海商务总会负责筹备工作，并设立“华商联合会办事处”。该办事处于1909年3月创办《华商联合报》，1910年2月改称《华商联合会报》，可谓是在全国工商界中最有影响的刊物。

以兵，多以商。中国积习轻商，业商者辄目为市井驵侩，士大夫羞称之，遂至商业堕落。农所生、工所成者，悉壅滞而不通，洋货且乘隙入，利权外漏，经济日困，民贫而世乱，国且幸存，其流毒可胜言哉。殿撰独见其大，于举世相轻之际，毅然纤苑阁之尊，而游厘市之末。使国中之人，咸晓然于商之足重，闻风而起，年来农工渔矿诸端，渐见兴举。虽时会所趋，然实殿撰提倡之力为多。殿撰家故儒素，初无厚蓄，徒以热忱毅力，号召一世。每创一公司，股本辄钜万，人鉴其诚，争相投资，集股为易，而殿撰乃得发挥经济而操胜焉。吾于此乃有感也。夫今之假公司为聚敛，而营业利害非所顾，假股票为赌博，而公司虚实非所问者，盖比比然，商业大蠹莫此为甚。吾闻殿撰凡创一业，于利害虚实之间，必预算精审，求夫稳妥而行之。故亿则屡中，附股者得岁取赢息，欣然色喜，而殿撰家业，且亦隆起也。昔史迁传货殖，陶朱、白圭之徒，辄侈然述之，以视殿撰殆过之矣。余颇欲叙述晚近商界钜子，作新货殖列传，若殿撰者，盖吾书中之重要人物也，不可谓难欤。”^①《华商联合会报》的这一评论，高度评价了张謇考中状元后离官场而去办工厂、开农场的旷古之举，称赞其为了救国救民而敢于改变重官轻商传统观念的表率作用。

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胡适，在张謇去世不久的1929年也有过这样的评论：“张季直（即张謇）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领袖毛泽东，则在1956年时指出：“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

① 《华商联合会报》第4期，1910年4月版，“海内外图画影片”。

②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胡序”，页3。

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①肯定了张謇在民族轻工业发展史中的贡献和地位。

上述各种评论都限于张謇的经济和社会事业方面，多持赞扬和肯定的评价，尤其称赞其对当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倡导和开拓作用。此后，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和开拓，对张謇的研究也逐渐扩展到各个领域，并受政治时势的影响，评判标准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评价的论调日益显得褒贬不一。对张謇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及其业绩，在肯定其某些客观进步意义的同时，更多的是批判其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封建主义、家族主义、不懂经济，农商总长任上的无所作为；对张謇的政治活动，除了少数论著对其“改良主义”的进步性和保守性及其由主张立宪向支持共和的转变，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论之外，大多采取一味批判其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的保守性和反动性。

所以出现这种褒贬轩轾的评论，除了时代的影响、论者的不同视角和不同见解之外，从张謇这个研究对象来说，则主要在于他是近代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过渡性前驱人物，也就是本书所说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张謇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在他的身上，既有现代社会的元素，又有传统社会的烙印；从他的言行中，既可以看到许多发人所未发、做人所未做的革新开拓之处，也可以看到一些改末保本、循序渐进的因循守旧之处；在他的社会实践上，既取得过成功的业绩，也免不了失败的悲剧。因此，张謇不是一个易于认识的历史人物，如果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评论。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最重要的是要用历史的尺度，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要把握他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并以此界定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总结他最有现实价值的经验教训。从这一点出发，本书认为张謇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值得以此为主题进行

^① 《张敬礼同志谈话记录》，张季直先生事业编纂处编：《大生纺织公司年鉴》，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407。

深入全面的研究,力求给张謇以实事求是的评论和应有的历史地位。所以说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其理由至少有下述四点:

首先,顺应和推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张謇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一个身兼多种角色的人物。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遭受了甲午中日战争和庚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达于极点,外国资本迅速扩张,半殖民地社会由此定型;同时,中国的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在屈辱中奋起,发生了戊戌维新、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和文化改革运动,提出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求富图强主张,兴起了民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传统农业和开办新式学校的潮流,使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成份、教育事业和社会生活向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在洋务运动中开始萌发的以发展资本主义和争取国家富强为主体取向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由此逐渐启动和推广。张謇可谓是中国爱国志士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员,在清末民初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中,每每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同情和参与过戊戌维新运动;策划和支持过立宪运动;组建和领导了江苏咨议局,并使之成为全国的典范;当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来临之时,他从主张立宪而转向拥护共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时,他不念旧交而毅然离去,坚决反对复辟帝制,从而表现了对时代潮流的应顺。他不仅自己提出过一系列的改革主张,而且向朝廷大员出谋划策,甚至代拟改革奏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他为了救国济民,在摘取状元桂冠之后,决然弃官从商,力图走“实业救国”之路,成为中国最早的儒商,为改变千年沿袭的重官轻商旧观念开风气之先。

其次,张謇提出了不少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思想创见。他在清末民初投身各种改革活动和担任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的同时,提出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棉铁主义”、“开放主义”、“民办官助”、“村落主义”等思想和主张。他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产生于甲午战争时期,是这两种思想的最早和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他早在1895年,就在为张之洞代拟的《条陈立国

自强疏》中,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这两种思想,提出了加强国防、广开新学、提倡商务、讲求工艺等建议,尤其强调了发展实业和教育对救国图强的重要性。他指出:面对列强即将汹涌而来的经济扩张,中国最好的抵御办法是采用保护政策,设立公司,尽快发展资本主义工商实业,抵制洋货倾销;而要发展工商实业,就必须要发展新式教育,培养各种实业人才,并把教育和工业置于致国富强的首要地位。他明确地指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①后来逐渐形成其著名的“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救国思想。“棉铁主义”、“开放主义”和“民办官助论”的思想,在清末时已开始产生,到出任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时形成为比较系统的思想理论,并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而提出,从而在国家政策层次上第一次把民生国计所必须的棉纺织工业和矿冶工业作为重点和突破产业;更加全面系统地提出自主引进外资的方针和方法;明确提出把官营一般民用企业改为民营,并把保护和扶植民营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国家工商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他的“村落主义”,可以说是他在家乡的经济和教育活动与并发的,到20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自治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思想库中,不仅在时间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内容上最为完整。张謇的地方自治理念,融实业开发、教育建设、慈善设施、公益事业、城市建设于一体。他曾明确指出:“查地方自治,以进增社会之能力,弥补人民之缺憾为其职志。而进行之事业,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教育发展,则能率于以增进;慈善之周遍,则缺憾于以弥补。”^②“地方自治条理甚繁,当以实业、教育为先务。”^③旨在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广泛动员地方力量,有部署有计划地建设好地方,

① 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卷,页29—41。

② 张謇:《为教养公积社备案事致南通县长书》,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612。

③ 张謇:《对于东台欢迎答词》,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页426—427。

而不是后来 1920 年代的一些地方势力和军阀官僚所热衷的以与中央政府分权为主要目的的地方自治，因而具有比较典型的区域现代化意义。张謇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虽然不能直接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独立、自主、民主和统一，因而也不能说是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但它作为近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方法，则不能不令人赞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人士探求现代化道路的步履足迹。

第三，张謇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先导的地位。他进行过各种开创性的经济建设活动，如以成功创办大生纱厂而刷新和推进了中国近代企业的股份制，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型农垦公司，创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企业集团，从而形成了“大生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官与商的关系。他创建和开设了一系列的新式教育和文化事业，诸如师范学校、纺织学校、盲哑学校、博物馆、刺绣艺术馆、新式剧院等。他开拓和推进了许多公益和慈善事业，如体育场、公园、幼儿园、养老院等。他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团体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如最早倡议设立商会和农会，组建和参与了预备立宪公会、江苏教育会、中央教育会、通州教育研究会、劝业研究会、盐政研究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清末民初的政治、教育和经济社团。

第四，张謇较好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性统一，突出地体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转型特点。他的一生经历过晚清状元、改革思想家、资本主义企业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动家和政府官员的职业生涯，而且把各种角色及其资源融为一体，把一些传统思想运用于自己的各项建设事业之中，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他创办各种企业虽然离不开赢利，但其最终目的不在乎赢利，而是为了利国福民，并把经营企业的赢利所得大量投资于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充分发挥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思想。如在创办他的第一个企业大生纱厂时，所以名之为“大生”，即取儒家所谓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涵义”^①，并以“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自勉^②，后来在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时，“亦不离此宗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从而尽到“儒者应尽的本分”^③。在从事地方自治事业时，所确立的出发点和目标是：“盖犹以孔子富而教之之义，使地方无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④

由此可见，张謇的经历和言行既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剧变，也表现了他个人的现代化素质和贡献。而且以其取得非凡业绩的大实业家风范，改革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法制体系的途径，组建和参与多种社会团体活动的渠道，首创全国模范县的榜样，对时代的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更为地方和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张謇作为早期现代化的一个前驱，他的言行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阶级和认识的局限，如他所主张和实践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社会改良并不能救中国，也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这已被近代历史所证实，也正是其前驱性的一种表现。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颇有价值的借鉴之处。

本书在借鉴和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所设定的主题，着重论述张謇的具有现代化意义的言行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求对张謇研究做出新的贡献。如张謇的现代化思想和活动中所体现的内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张謇的现代化思想的渊源及其特点；张謇的企业经营模式及其在近代中国企业文化制度变革中的价值；张謇在担任农商总长时期的管理机构和经济制度改革及其对政府职能转变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建设的影响；张謇对社会团体的参与和支持及其所具有的现代化社会的动员作用，张謇的地方自治活动及其特点和所体现的区域现代化意

①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页252。

② 《南通纺织史图录》编辑部编：《南通纺织史图录》，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30。

③ 刘厚生：《张謇传记》，页252。

④ 张謇：《对于东台欢迎答词》，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页427。

义。同时,也要总结张謇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而努力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为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本书的内容结构,按照张謇的言行和业绩所具有的各种现代化价值,分类设计章节,以突显主题。全书分为三个层次、九个方面撰写。第一个层次论述张謇自身的现代化素质,内中包括第一和第二章,分别论述张謇个人的潜在现代化素质及其养成过程,他的现代化思想及其特点;第二个层次论述张謇个人的现代化事业及其历史意义,内中包括第三至六章,分别考察张謇所从事的“大生”企业集团、盐业和盐政改革活动、各种教育活动和民主政治活动;第三个层次论述张謇对社会乃至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和影响,内中包括第七至九章,分别剖析他担任农商总长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业绩和贡献,参与和领导各种社团现代化活动的情况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动员作用,对南通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及其所具有的区域现代化模式的意义。

本书的撰写工作得到了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张謇研究基金的资助,得到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张绪武先生的支持,得到了我的恩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先生的指导。书稿编写完成之后,正在寻求出版之际,承蒙李文海先生的赏识和推荐,经几位专家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使书稿臻于完善,荣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之一。对他们的支持和关心,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虽由我负设计、主编和统稿之责,但主要依靠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完成。各章节的撰稿者分别为:

序: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前言、第一章: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第二章:朱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田桐(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第三章:第一、二节: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第三至五节:陈争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第四章:邱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曾凡英(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

第五章:马 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六章:第一节:苑书义(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第二至五节:侯宜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七章: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八章:第一节:马 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二节:马 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第三节: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九章:王奇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结 语: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虞和平

2004年3月6日

前 言

张謇字季直，50岁以后以啬庵为号，晚年则自称啬翁。清朝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自幼接受以科举致仕为宗旨的旧式教育。同治七年（1868）考取附学生员，那年才15岁。但以后多次参加乡试不中，曾在外地游幕多年以贴补家用，其间曾作为庆军统帅助手前往朝鲜协助国王平叛，得到多方面的历练。光绪十一年（1885）应顺天乡试中举，而其后连续四次会试均未取中，乃尽弃试具以示绝意科举。

光绪二十年（1894）正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在北京举行恩科会试。张謇在父兄殷切敦促下前往参加，结果高中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但在严重民族危机刺激下，张謇对科举致仕的道路厌倦已极，遂转而从事实业与教育，并进而倡导地方自治。光绪二十二年（1896）开始议办通州纱厂，三年以后建成大生纱厂并开车出纱。光绪二十六年（1900）筹建通海垦牧公司，次年冬正式开工。光绪二十八年（1902）筹建通州师范学校。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并至其他各地考察，收获颇大，回